

# 社会资本的理论和应用(两篇)

## 定义社会资本： 一个整体视野的分析与考察

周长城 王培刚

(武汉大学 社会学系,湖北 武汉 430072)

**〔提 要〕** 社会资本日益成为人们关注的热门概念和分析的重要起点,但在社会资本概念的定义上却存在着极大的分歧。为厘清思路,本文先考察了社会资本概念提出的主要背景和在研究中的重要意义;又根据概念的外延宽窄对社会资本定义的分歧作了一个系统的回顾与评析;而后指出不同种类的但可以互相促进的社会资本共存于社会中。因此,需要一个整体的视野来定义和测量社会资本,以沟通一些文献里的正式和非正式制度中的横向和纵向、微观和宏观制度的社会资本的区别。并设想了一个可以测量社会资本的整体公式。

**〔关键词〕** 社会资本;整体视野;测量

**〔中图分类号〕** C912.6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3637(2005)02-0076-05

### 一、社会资本概念的提出及其意义

社会资本理论是20世纪70年代后期在社会网络研究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与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相对立的理论概念。近年来,社会资本概念日益成为社会科学研究领域中的新热点,它不仅吸引了社会学、经济学和政治学等多个学科领域研究者的兴趣,而且引起了社会公众的广泛关注。之所以如此,主要是西方国家中极端的个人主义和向更小的共同体回归的双向变化的结果。70年代末出现的新自由主义在政治上和社会思想上的盛行对这种双向发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在普特南看来,个人的原子化状态背离了西方社会,尤其是美国的互助的共同体传统,造成了美国“社会资本”的衰落,进而使美国的民主制度背离了托克维尔时代的状态。而卡尔·博格斯(Boggs)则提出,60年代以来美国公共领域出现了不断衰落的迹象,在社会文化上体现为消解政治的文化的强大,地方主义、形而上学、后现代主义等思潮借此消彼长,相互推动;在实践上体现为各种背离政治或者反政治的运动的出现。例如反对“大政治”运动、城市暴乱、生态运动、回归本地以及所谓的“飞地文化”运动等。这些变化是对长期确立的公民传统的反动,割裂了国家与公民之间的关系,削弱了社会作为一个共同体的内在和谐关系。西方社会政治生活的变化直接推动了理论界对既有理论范式和概念的反思,社会资本就是在这种大背景下出现的,有利于研究的重点向制度、文化理念等社会的深层结构转变。

社会资本尤其为社会学家提供了更有效的概念和政策手段,从而超越了枯竭的现代化和世界体系理论,并潜在地对经济发展问题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对某些方面的传统经济

观点进行了补充,对其他观点发出了挑战。然而,社会资本的最大价值在于,针对当代某些最迫切的问题,它为用多学科和跨学科的方法进行广泛探讨提供了可靠的起点。它把价值判断和文化纳入了分析的框架之中,不仅使对社会行动者的行为动因解释更加全面深入,而且对于描述和分析宏观层次上的集体行为和长期选择也有很强的说服力。它还希望把微观层次的个人、选择与宏观层次的集体和社会选择结合在一起的努力很有开创性和启发性。

社会资本概念提出的主要意义是什么呢?我们知道,社会资本理论有一个对个人行动的基本假定,假定是理性的。这个假定在社会学的大部分著作中难以看到。在吉登斯的理论中,个人和结构都具有二元性。既然结构和个人互动具有此种性质,那如何在理论上用一个基本的概念去替代具有结构主义特色的“结构”一词呢?吉登斯是通过对社会结构的重新定义,即把社会结构视为规则和资源来完成的。在使用这些规则和资源时,行动者在时空中维持和再生产出结构(特纳,1987)。很显然,吉登斯的概念仍具有结构主义的意味。社会资本概念则完全去掉了结构主义的影子。由于缺乏对行动者理性化的假定,为了摆脱结构主义的影子,或者只能从事民族志式的工作,或是让理论仍带有结构主义的色彩,对理论的发展形成了某种程度的限制,造成了社会学和经济学对话的阻隔。将结构定义为社会资本有利于把网络与传统的经济理论连接起来。我们可以设想,首先,有策略思想的企业家们投资于社会资本。这种投资可能使他们在未来的策略网络和次序中处于有利的地位;其次,如果每个人想根据自己的目的控制策略网络,并为此而向群体内其他

# 社会学研究

个体散布信息。社会资本的概念也可以用来研究这种做法。这里,企业家不追求每场对弈支付结果的最大化,但试图了解每场对弈结果对社会资本存量的影响(何梦笔,1996)。社会资本按其定义是可观察的概念,因此这个命题排除了主观效用最大化思想(何梦笔,1996)。当然和经济学不同的是,社会资本并非完全由人随心所欲地创造,它既为一种资源,也为一种制约。

## 二、社会资本概念的争议与评介

虽然社会资本具有强大的解释力量,但在社会资本的界定上至今仍没有取得完全一致的认同观点,这导致了在整个研究工作中缺乏系统性和不同学科之间缺少相互的沟通和互补。武考克(Woolcock,1998)通过对社会资本研究整体状态的清理,提出目前社会资本研究中存在四个缺陷:(1)社会资本的修正派在解释问题上有概念过窄、解释过宽之嫌。(2)社会资本概念的混乱,社会资本究竟是社会关系的基础还是社会关系的内容,是“中介”还是“信息”,抑或是二者的结合。(3)社会资本在政治领域的广泛使用带来了不同的解释结果。(4)在社会资本的数量问题上还存在模糊的认识。因此,笔者本文对社会资本概念的探讨就是希望能够突破以往学科对立的研究局限及单纯的综述研究方式,从学科的综合视角来探讨社会资本概念的分歧与测量。

因此,要在学理上对社会资本概念进行最有效的抽象,形成学术研究上的基本共识,以推动学术对话的任务已迫在眉睫。使社会维系在一起的“粘合剂”(Seragldin,1996)大体上被认为它同一种“归属”的感觉以及共同的行为规范一起都是社会秩序所必须的,这种内部凝聚力帮助我们定义社会资本。没有它,整个的社会将无法良性运行,更不用谈论经济增长、环境的可持续或是人类的健康——正如索马里、南斯拉夫、卢旺达所呈现的那样。从正的一面看,社会资本可以从一些拥有相似存量的自然、生产及人力资本但却产生了很不相同的经济表现的国家中间接辨认出来。

社会资本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例子不胜枚举,但要给社会资本一个明确的定义却不那么容易。但关于社会资本就是一种用以促进人类行动的社会结构性资源这一点上,几乎所有的学者都是一致认同的。所不同的是,不同学科的学者又是从不同学科角度来定义社会资本概念并加以使用的。纵观社会资本的定義及其使用,我们发现大致可以分为三类:用政治经济学家奥斯特罗姆(Ostrom,1990)的话概括就是最狭义的社会资本观、过渡的社会资本观以及扩展的社会资本观。布朗(2000)从另外一个角度概括了社会资本概念使用的总体状况。他指出,他的本体论的起点是系统主义,社会资本是一个程序系统,这个系统根据组成社会网络的个体之间的关系模式分配社会网络资源。他对社会资本概念的理解也就建立在三个不同的层次的不同使用上。笔者认为,其实社会资本概念的不断扩展与演化也主要经历了三个过程,下面就根据其概念的外延宽窄来对此过程进行划分和评析。

对社会资本所下的定义中最为人所知的也是最狭义的一种是普特南(Putnam,1993; Putnam,Leonardi & Nanetti,

1993)。普特南认为社会资本是人们组成的一系列水平的社团,组成这些社团的都是能对他们所在社区生产能力产生影响的人。这些社团包括“市民公约网络”及社会规则,这一概念是由两个假设支撑着:第一,公约与规则是以经验为主的联系在一起的;第二,它们能产生重要的经济上的后果。在这个定义中,社会资本是最主要的特征就是它有助于社团成员相互利益的调和(Putnam,1993)。时隔不久,他实际上又在同一意义上使用了这个词:“我用‘社会资本’一词来指称社会生活的这样一些特征——他们有助于参与者更加有效地共同行动以追求共同目标,比如网络、规范以及信任等。”(Putnam,1995)。西方学者认为:普特南在这里实际上是将“社会资本看成了主观的社会规范(信任)、客观的社会特征(社会网络)和结果(有效性和效能)的交融物和混合物。这种处理方式的好处是,它将概念的不同方面以一种有趣的方式结合起来,从而赋予它们以巨大的解释潜力。同样地,它也存在不足,即将不同的事物糅合在一起,甚或是混用了起来,而这些事物之间的关系本应是经验性调查的对象。”(纽顿,2000)。

第二个比普特南更广的社会资本定义是科尔曼(Coleman,1988)下的。科尔曼认为社会资本是“根据它的功能定义的。它不是一个单一体,而是许多不同的实体,它们有两个共同点:都包括社会机构的某些方面,都有利于处于同一结构中的个人或全体的某些行动。和其他形式的资本一样,社会资本也是生产性的,使某些目的的实现成为可能。而在缺少它的时候,这些目的不会实现。”从一开始,这个定义包含就较广,它不仅包含水平的社团还包括垂直的社团以及其它一些实体,像公司的行为。这里包含的这团的范围就更广,并且这些社团可以是起正面效应也可以是起负面效应。科尔曼明确提出:“能有助某些行为的某种特定形式的社会资本可能对于别的行为是无用的甚至是有害的”(Coleman,1988)。事实上,关于社会资本的这种观点,不仅包含了全部的社会结构也包含了管理人际行为的所有准则。

第三个更广的社会资本的概念是制度经济学做出的。该学派将社会资本界定为社会中社会生活和文化内在的粘合剂,包括调节人们之间行动的规范和价值观念,以及生产这些规范和价值观念的制度。显然这个概念包括了促进规范发展和塑造社会结构的社会和政治环境。除了前两种社会资本概念包括的非正式的、通常是地方性的、大量的横向的和纵向的联系以外,这个社会资本还包括更正式的机构间的关系和结构,如政府、政府制度、法律、司法体制以及公民自由和政治自由。显然这个社会资本概念主要受诺斯(North,1990)和奥尔森(Olson1982)关于制度的观点的影响,他们二人都认为制度对于经济发展的速度和经济发展的模式有着重要影响。

上述三种社会资本概念不是相互替代,而是相互补充的。从他们各自的定义中,我们不难看出其共同点(见图1)。

图1 有关社会资本的三种观点

这三种观点逐渐扩大了它的概念。第一种主要包括非正式和当地的横向社团,第二种增加了有层次的社团,第三种以前两种为基础并加入了正式的国家范围的体系,如政府和法律规则。这三种观点有以下几个共同特点:

它们都将经济、社会及政治领域联系起来,并且它们都认为社会关系影响经济活动并受着经济活动的影响。

它们都关注着经济主体间的关系以及这些经济主体中的正式和非正式的组织提高经济活动率的方法。

它们都暗示合适的社会关系及社会制度有着正面的外溢效应。但由于个人不能够擅用这些外溢,主体们都倾向于对社会资本投入不足,要公众来支持。

三种观点不仅都意识到了社会关系为发展所创造的潜力也同样意识到了这些社会关系带来负面效应的可能性。这些社会关系的作用取决于关系的性质(横向或纵向),及先前的行为准则和价值观以及法律和政治的大环境。

### 三、社会资本概念的层次与测量

社会资本的测量一直是社会资本研究中存在争议的问题。福山指出,社会资本概念最大的弱点之一,就是缺乏如何测量社会资本的一致看法。他认为,至少有两个方法已经被用来测量社会资本,一个就是对某一个社会的群体或者群体成员资格进行调查,另一个则是使用关于信任水平和公民参与水平的调查数据。关于社会资本的测量的困难主要体现在社会资本测量的概念和方法论问题上,这也是社会资本理论遭到批评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尤其在社会资本理论的测量层次问题上,由于这方面存在的争议,导致了不同国别和不同时空对社会资本界定的含糊性和随意性。这也是本文对社会资本测量问题进行探讨的初衷和重要原因。

我们认为整体的看待社会资本是测量和操作社会资本概念的重要一步,也是跨学科研究的重要一步。这种整体的观点应是以肯定四种资本能够并存并且应使社会资本对经济和社会的效用的最大化为基础理论的。这种互补性不仅适用于四种资本之间并且适用于各种资本内部,物质资本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生产过程是不同种类的物质资本共同作用的过程(例如生产货物的机器设备、安置机器设置的工厂、运输工人到工厂及运输货物至市场的公路)。

Stone(Stone, Levy & Paredes, 1992)等通过对巴西和智利两国服装业的比较阐述了微观和宏观层面的社会资本的互补性以及替代上的局限性。巴西拥有一个复杂的规范体系,但它们的法律经常并不一致,仲裁制度的费用也十分昂贵。因此企业们学会了在与顾客和供应商的日常交易中特别是涉及到信用时,依靠非正式的途径。巴西服装业也制定了一个有效的非正式的信用信息体系,这好比给它的好名声上了一个保险。然而,合同仍不可靠,经常重新谈判,甚至是在即将发货的时候。企业家们因此采取了降低风险的策略——譬如只生产标准型号的货物并减少定额——这最终会有碍生产的扩大。

与此相反,智利的法律体系相对简单,合同也都是有程序的实施,这使得签订合同的过程更加安全,很少的合同经过了再次谈判,拖欠率也有了下降。这一对此表明了非正式社团能取代法律以及一个正式的仲裁体系的范围是有限的,因此突出了宏观层面的社会资本对商业的重要作用,特别是政

府在提供一个简单透明的、一致的商业环境的重要作用。

微观和宏观层面社会资本的互补性不仅影响着经济同时对二者自身也起着互相增强的作用。宏观制度可以为微观制度的兴旺发展提供一个良好的环境,而地方社团则帮助巩固地区和国家制度,为它们提供维持稳定的方式。对两者相互作用起关键作用的是相同的价值观、准则以及相互的信任。这些可以从两个层次社会资本是某一常见实体(可以是国家自身)或是一常见目标(如和平或是经济增长)(图2A)的认同和接受中体现出来。在瑞士,各州都并入了联邦,共同支持创造一个主权国家的目标,这即是微观宏观层次成功的相互作用的一个很好例子——事实上,现在的瑞士可以用图2B表示,地方制度并不是一开始就要求仅遵循它们之间的规则,同样也要求遵循宏观制度的准则。然而内聚力作为制度很可能就会通过联合或跳过地方层次的规则到一个共同的目标,当制度层次和宏观层次的这种互相促进的相互作用增加了社会资本的存量。

有时,可能会出现微观和宏观制度没有能够很好的遵循共同的规则,互不信任(见图3A),这样会使情况不稳定,以至各种联系的纽带都断开了(图3B)。如果涉及的规则是基本的人的尊严,那结果是内乱或战争,如有南斯拉夫。如果是经济领域的不信任,结果则会经济倒退,如在魁北克。

在众多因素中,决定究竟是正面(图2)还是反面(图3)情况占上风的是宏观层次的框架以及这个框架在多大程度上被微观层次接受,并认为它是合理的、公平的和具有代表性的。另外,正式与非正式制度之间的关系也是需要考虑的。在地方层次政府以及其它机构与一系列的非正式关系网、联合框架、自愿组成的社团相互作用。这些相互作用规定了其人、家庭、集体活动的范围及有关限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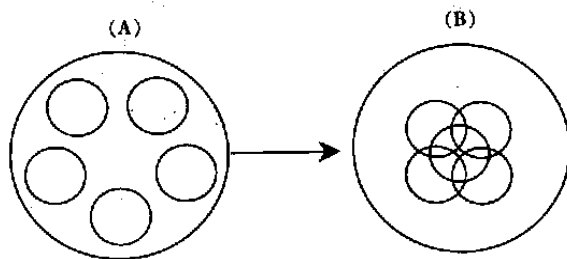


图2 宏观和微观制度间正面相互作用的情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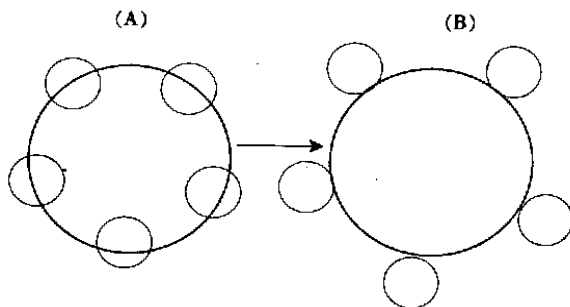


图3 宏观和微观制度间反面相互作用的情况

# 社会学研究

微观和宏观社会资本间相互作用的过程是动态的,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在成功发展的过程中,非正式的社团、网络逐渐的取代了正式的行政机构和非个性化的市场机构。大的匿名市场比网络的效率更高,因为“最佳”买主和卖主也可能并不属于某个关系网。如果这样发展途径又有了牢靠的仲裁体系以及维护合同执行的机制的支持,匿名市场将最终取代“网络”内的“名义”交易(网络中经济主体的数量较少,因此互相知道对方的姓名)。在这种情况下,参与的所有经济主体都受益。

我们认为在原则上,不同种类层次的社会资本的互补是能广泛被认知和接受的,但经验表明要把握这种互补并不是这么简单的,再者由非正式网络的转变应视为社会资本的增加还是减少——或是总量不变,只是社会资本的一种单元取代另一种单元?测量社会资本第一步应是将微观和宏观层的指数相加,这种指数类似于人类发展和身体素质指数,对于微观层指标,有 Narayan 和 Pritchett (1996) 采用的普特南型的交往活动;对于宏观层指标,有 Knack、Keefe、Klitgaard 和 Fedderke (1995) 的跨国分析以及 Rose (1995a, 1995b, 1995c) 采用的宏观制度和信任度指标。原则上,同一国家的指数是可以相加的(这是以一般的测量合成指数的方法中得出的)。

测量微观与宏观层社会资本间的互补性或反馈过程——特别是过程应该是相加还是相乘——则更是困难的,上一段中提到的指数采取了相加的方法。从概念上讲,要描述一个涉及生产功能的乘数或幂指数型过程并不难,并且社会资本可以像技术一样作为等式中的一个因子。这样,一些形式的社会资本以加法的方式进入该过程而另一些以乘的方法进入。依据经验来评估它们的功能在现在还是一个遥远的目标,但我们可以从概念角度出发,首先考虑一下该功能应被视为哪种数学形式,然后用理论上的概念来引导经验式的调查,而调查的结果又被反馈到理论中,验证、否定或完善理论,这样就会得出一个被认可和接受的概念界定。

上面我们设想了一个社会资本的整体公式。我们认为在特定的国家、特定的时间,总会存在一个恰当的社会资本水平和构成。各种不同的社会资本都是产生最佳结果所必须的(并且它们之间是互相促进的),这也意味着——存在一种不同社会资本的“最佳组合”。我们认为能够为指定的国家选出一个“合适的技术”来使它对其它生产要素产生最大的作用,这就必须考虑到这些要素间的互补性和替代性。实际中恰当的技术的鉴定并不等同于正规的经济模型,而是以对该国有熟悉的了解和特别的见解为基础的。对于社会资本情况也是这样的,同样需要提高生产中其它要素组合的效率。

决定合适的社会资本组成的关键是数据——关于总存量的构成和水平的数据。这一信息来源需考虑到一个国家其它可利用的资本。我们认为最可取的方法是挑选一些关于微观制度资料已经非常齐全的国家进行案例分析。这些案例分析需要调查这些制度与其他组织及各层政府的相关情况并判定他们影响到了哪些经济过程(以及涉及了哪些层次和种类的人力、物力和自然资本)。

## 四、结论与思考

本篇论文为了让大家更好的了解社会资本。首先笔者根据概念的外延宽窄对社会资本定义的分歧做了一个系统的回顾与评析。然后,指出不同种类的但可以互相促进的社会资本共存于社会中。因此,需要一个整体的视野来定义和测量社会资本以沟通一些文献里的正式和非正式制度中的横向和纵向、微观和宏观制度的社会资本的区别。再后,设想了一个社会资本的整体公式并提议对不同种类的社会资本间的相互作用的加数和乘法进行不断的调查。接下来,我们又谈到在特定的国家、特定的时间,总会存在一个恰当的社会资本水平和构成,这一水平也应考虑到与其它资本的互补性。社会资本的构成会随时间而变动,但总量应是不断的积累增加。我们希望对社会资本概念的讨论能更有助于我们更好的了解社会资本是怎样为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做出贡献的。所提出的建议也对概念化和测量方法提出了新的要求。

我国的学者对社会资本的介绍和应用大致是从 90 年代中期开始,主要在社会学领域中,应用的主要是乡镇企业、私营企业发展原因和农民工流动的方式(李路路, 1995; 郭于华, 1997)。由于中国社会文化的特殊性以及中国改革以来出现的巨大变化,以社会资本为基点进行研究还有许多方面需要进一步开辟和深化。

## 参考文献:

1. 布朗:《社会资本理论综述》,载李惠斌等编《社会资本与社会发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77 - 80 页。
2. 郭于华:《关系资本·网络型流动·乡土性劳动力市场问题的提出》,载孙立平主编《转型期的中国社会》,改革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10 - 85 页。
3. 何梦笔:《网络、文化与华人社会经济行为方式》,山西经济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152 页。
4. 李路路:《社会资本与私营企业家》,《社会学研究》1995 年第 5 期。
5. 纽顿:《社会资本和现代欧洲民主》,载李惠斌等编《社会资本与社会发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379 - 411 页。
6. 特纳:《社会学理论的结构》,吴曲辉等译,浙江人民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562 - 570 页。
7. Coleman James. 1988. "Social Capital in the Creation of Human Capital."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94 (Supplement) :S95 - S120.
8. Knack, Stephen, and Philip Keefer. 1995. "Institutions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Cross - Country Tests Using Alternative Institutional Measures." *Economics and Politics* 7 (3) :202 - 27.
9. Narayan, Deepe, and Lant Pritchett. 1996. "Cents and Sociability: Household Income and Social Capital in Rural Tanzania." Environment Department, processed. World Bank, Washington, D. C.
10. North, Douglass Cecil. 1990. *Institutions,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1. Olson, Mancur. 1982. *The Rise and Decline of Nations: Economic Growth, Stagflation, and Social Rigiditie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2. Ostrom, Elinor. 1990. *Governing the Commons: the Evolution of Institutions for Collective Ac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关系资本:农民阶层分化的有力路径

——安徽两村实地调查

蔡翥<sup>1</sup> 朱士群<sup>2</sup>

(1. 安徽医科大学 人文学院;2. 安徽大学 社会学系,安徽 合肥 230032)

**【提 要】** 在中国农村大规模、高速度的社会阶层分化进程中,“关系”正被作为一种社会资本,为农民理性行动者所发掘,成为其获取优势社会地位、实现利益最大化的有力路径。本文将研究视角放在微观层次上,选择关系资本为分析路径,以实地调查和理论研究相结合的形式,研究当代中国农村,特别是以安徽为典型形态的中部地区农村农民的社会阶层分化问题,探讨转型期关系资本与农民阶层分化问题的关联。

**【关键词】** 农民;关系资本;阶层分化

**【中图分类号】** C912.8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3637(2005)02-0080-05

当代中国农民阶层分化可以说就是一个资源再分配、利益格局重构的过程,农村社会的同质性在迅速减弱,异质性急速增加。目前大多数研究还是从国家宏观层面出发,从客位研究角度来揭示这一问题。然而,在农民开始继续职业转变、追求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中,社会宏观层面上的制度性动力、转变主体的自身条件虽是不可或缺的,但是为获得非农化机会这一相对稀缺的社会资源,农民还必须借助自身之外的社会资源,对于大多数农民来讲,这些社会资源主要就是“关系”。笔者以为,理论界对于分化主体——农民使用关系资本的理性行动和内在过程,尚未给予特殊的、足够的关注,还有必要从社会学的视角予以详查,因此,笔者选择了两个发展类型不同、发展水平不等的村落进行对比性实地调查研究,探讨农民理性行动者对关系资本的运作与农村社会阶层分化之间的关联。

### 一、关系资本解析农民分层的基本思路

大规模、高速度的社会阶层分化是农村改革开放以来发生的最为深刻的变化之一。从宏观上看,农民的社会阶层分化是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由国家制度安排上的转变所引致的。然而,在微观层次上,农民具体的分化过程,仍然不外

乎根据自己的条件,设计自己的行为,以求得在阶层分化、利益重构的过程中,尽量取得较为优势的地位。在农村社区的这场对社会资源的再争夺中,由于制度性空间无法提供充分的机会,农民理性行动者在利益的驱动下,必然要在制度性空间之外借助于各种其它渠道和手段,他们开始了对传统关系网络的筛选优化,创建新的利益工具性关系,构建新的社会关系网。因此,笔者从关系网络的社会资本功能的角度出发,以“关系资本”作为分析路径,从农民主位角度来研究当代中国农村的社会分层问题,并探讨农民理性行动者对关系资本的占有、使用与农村社会阶层分化之间的关联。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曾经明确指出:资本的总公式是  $G - W - G'$ ,而在这一过程中,原预付价值不仅在流通中保存下来,而且在流通中改变了自己的价值量,加上了一个剩余价值,或者说增殖了。正是这种运动使价值转化为资本。因此,马克思对资本的概念阐释应该包括了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处于运动之中,在运动中不断实现自身积累;二是资本是创造剩余价值不可缺少的手段或工具,即具有工具性效用;三是资本所反映的不仅是人与物的关系,而其本质上反映的是人与人的关系,即资本家对雇佣劳动者的剥削关系。

13. Putnam, Robert D. 1993. "The Prosperous Community - Social Capital and Public Life." *The American Prospect* 13:35 - 42.

——. 1995. "Turn in, Turning out: The Strange Disappearance of Social Capital in America." *Political Science and Politics*, Vol. 28, No. 664 - 83.

14. Putnam, Robert D., R. Leonardi, and Raffaella Nanetti. 1993. *Making Democracy Work: Civic Traditions in Modern Ital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5. Rose, Richard. 1995a. "Adaptation, Resilience and Destitution - Alternative Responses to Transition in Ukraine." *Problem of Post - Communism* (November/ December): 52 - 61.

——. 1995b. "New Russia Barometer IV - Survey Results." *Studies in Public Policy* No. 250. University of Strathclde Review, Glasgow.

——. 1995c. "Russia as an Hour - Glass Society: A Constitution without Citizens." *East European Constitutional Review* 4(3): 34 - 42.

16. Serageldin, Ismail. 1996. "Sustainability as Opportunity and the Problem of Social Capital." *The Brown Journal of World Affairs* 3(2): 187 - 203.

17. Stone, Andrew W., Brian Levy, and Richardo Paredes. 1992. "Public Institutions and Private Transactions: The Legal and Regulatory Environment for Business Transactions in Brazil and Chile."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No. 891. World Bank, Washington, D. C.

18. Woolcock, Michael. 1998. "Social Capit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ory and Society* 27.

责任编辑:胡政平;校对:文德